

徐学林 著

徽州出版史叙论

徽州的特色内蕴丰富，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大量编刊丛书。丛书包罗群籍，最便于

推出汉魏丛书，这部公认的真正丛书后，徽州府

推出著名的徽州丛书，有吴勉学的《二十子古今

吴琯的《古今逸史》、薛氏《居业》二十种、程百的

内的《坐隐先生全集》、江湛然的《火室山房全集》、

名常集、《山居杂志》、黄与任的《阳春奏》等。这些丛书

不遗余力，有功出版和古籍整理史册。有的分门

得《我》的大观，深受士林和多层次读者的欢迎。他

不少，不少图书多有名。我

安徽美术出版社

目 录

徽州府印刷艺术是古代出版艺术的顶峰

——试论源远流长的安徽古代出版业 (1)

闻名遐迩的安徽文房四宝 (79)

鲜为人知的安徽官书局 (99)

安徽丛书编审会与《安徽丛书》 (102)

抗战前的特殊出版机构

——记安庆安徽省立图书馆 (106)

开时代风气的编辑家张潮 (110)

“经训克家”的编辑家毕沅 (119)

以书为命的古籍整理大家鲍廷博 (125)

命运坎坷、勤奋为学的编辑家洪亮吉 (136)

朝访残碑夕勘书 石墨琅书共一龛

——近代藏书、出版大家徐乃昌传略 (144)

精于理财 拼命存古

——近代大出版家刘世珩传略 (156)

美术出版家、“印痴”汪启淑 (172)

怀念王子野 (178)

安徽清代禁书与五大文字狱案 (181)

后记 (190)

徽州府印刷艺术是古代出版艺术的顶峰

——试论源远流长的安徽古代出版业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印刷术的发明在世界科技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出版事业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中国古代的出版业一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安徽地区的古代出版业则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部分。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有不少是在安徽地区或由江淮大地上的杰出人物来完成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大批有远见卓识、资金雄厚、文化素养很高的徽商和文人学士介入出版业,使徽州地区(今大部为黄山市)的出版事业异军突起,出现影响和左右全国出版形势的历史现象,小小六邑之地的徽州府曾长时期成为全国古代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的出版艺术把中国古代出版印刷艺术推向历史的顶峰。它的许多成功的经验特别引起印刷出版史专家学者们的注目。

一、源远流长的安徽古代出版业

研究出版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要研究编、印、发的全过程,要研究各种载体构成的书籍。本文囿于篇幅,仅研究雕版印刷术发

明后，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繁荣昌盛的千年出版史。

我国的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多数学者认为始于7世纪初的初唐，流行于中唐时期。从历史文献和现存的实物来看，唐和五代时期的出版物主要有历书、释佛像和佛经中的《陀罗尼经咒》、《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华经》、道家的《刘宏传》等，以及中晚唐时期西川的字韵书、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等和江浙、安徽地区的诗文集等。

（一）安徽地区古代出版印刷业的产生

安徽地区古代的出版业紧步全国后尘。现有的资料表明，它的产生不晚于中唐时期，至五代时期有所发展。早期的印刷品为日历、佛教经卷及诗文集类。安徽地区流通的私刻历书至迟在唐大和九年(835)以前，诗文集则在长庆四年(825)之前。

关于私印历书，《全唐文·冯宿奏疏》卷624记载了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二十九日)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禁止私印售日历说：“剑南、两川、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唐时的淮南道在今安徽地区设有和州(治今和县)、庐州(治今合肥市)、濠州(治今凤阳县临淮镇北)、滁州(治今滁州市区)、寿州(治今寿县)、舒州(治今潜山县)6州。这说明公元801年颁布由官方刻印日历才30多年，安徽地区已有私自印售历书的事。冯宿这本维护皇权的奏章很快得到批准：“准敕，禁断印日历版。”冯宿的奏疏是最早记载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文献。这件事也写到《旧唐书》上。该书17卷《文宗本纪》有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版。”

还有宋·王说在《唐语林》卷7上记载，唐王朝在颁布禁断私印日历书不到半个世纪，又出现了江东道因私印日历扭送公堂的事。其文曰：“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售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

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这件事说明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已使摇摇欲坠的唐政权无力干涉民间私自印售历书的事了，仅斥去了事。它给我们透露了唐代的歙州（今黄山市）地区的出版信息。

唐代安徽地区出版诗文集、字书的信息有以下几例：

一是长期在安徽宣、宿州地区生活的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作被民间模勒。元稹在长庆四年（825）冬十二月十日为白居易诗集所作的序中提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古代的扬、越地区包括今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省和上海市。白、元的诗作没有查到当时的刻石记载。这种模勒只能是指雕版印刷。

二是明嘉靖五年（1526），芜湖榷使张大用在芜湖文庙李阳冰谦卦碑刻石跋中说：“阳冰篆书，祖秦相（李）斯，而笔刀过之。舒元與辈论之详矣。是刻藏芜湖王氏，国初得之当涂县治，风骨雅健，卓有古意。近诸刻失之矣。岂即宝应（762—763年）间作令时书耶？岁久板几拆裂。”提出李阳冰在任当涂令时曾将谦卦中的爻辞书写版刻于当涂。此刻中有20个“谦”字，无一相同，书法界一向视为墨苑中的至宝。

还有李白在临终时，请李阳冰将其诗作疏理付之梨枣也是一件值得考证的出版大事件。

1974年4月，在阜阳市西郊的水利工地上发掘了一座晚唐时期的船形砖墓，出土了1只银锡里收藏了迭在一起的微黄的桑皮纸写、刻的《陀罗尼经咒》各1张。因银锡微裂，致使长期浸泡在尸水里的经卷各损其半。其中，刻印的经卷呈方形，边长26厘米，外沿四周刻印净瓶、绶带、莲花、火焰等八宝图案，内刻印度悉昙体梵文陀罗尼经感叹调。该经卷采用对角旋转向内刻印，经文中间有佛像。这是晚唐期间流行的刻经，字体清晰，图文精美，现藏阜阳地区

博物馆,是国内可数的珍贵的唐刻经的一种。可惜,因缺下半截,致使无法断定具体的刻印时间、地点、刻印者。但可断定唐代的刻经已在安徽地区流行。

五代时期,关于安徽地区流通的刻印书籍已见诸文字记载。《册府元龟》卷 608 载,后唐宰相冯道“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无经典”。吴地,含今安徽地区,说明印售的书籍品种很多。安徽地区具体的出版情况也有两则文字记载。

一是《旧五代史·晋书·高祖本纪》载,亳州太清宫(即今亳州市道德中宫)道士张荐明奉石敬瑭之命,“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这是安徽地区载之正史的第一部雕版印书。

二是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中载,南唐保大五年(947)寿春(今寿县)刻《金刚经》1 卷。这是安徽地区在古代书目中有确切印制年代的第一部刻印书。

(二)繁荣发达的宋元出版业

宋元时期(960—1368 年),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今大陆存有宋版书千余种,台湾所遗包括残书及复本不下 200 部。今存元版书约六七百种,台湾省所藏包括残缺和复本也有 230 余部。宋元时期,安徽地区已形成以徽州为中心的沿江府州刻书带,出版业十分繁荣。

笔者在编写《安徽省志·出版志》时整理了名为《历代皖版综录》的资料,从历史文献、历代书目和现存实物等方面资料进行排列,现已掌握安徽省解放前出版的各类图书不下万种,涉及上千出版机构和出版家。笔者根据这个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宋元时期安徽地区刻书近 150 种,加上重版、修补版和重印版,不下 200 起。这还不包括程大昌、朱熹、大小吕东莱、吕乔年、汪纲、祝洙等皖籍官僚学者在外地所刻的书。一个地区能刻这么多种书,无疑是全国重要

的出版地区,仅次于当时的出版中心汴梁、江浙、福建、四川地区。

北宋时期(960—1127年),安徽地区政治安定,尤其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梅尧臣、欧阳修、晏殊、苏辙、王安石等人长期生活和为官安徽地区,使安徽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一时期,大江南北地区公私刻书盛行,图书市场繁荣。北宋时期整个地区出版情况因缺乏资料和实物,难以概括全貌。但从现在掌握的材料还是可以看出当时安徽地区出版业的一斑的。

《宋史·郭延泽传》卷271载,南唐秘书省正字,入宋任著作佐郎,转殿中丞,出任建州知州的郭延泽,致仕后,在濠州城(今凤阳县临淮镇)南“有小园以自娱。其咏牡丹(诗)千余首,聚图籍万余卷,手自刊校”。他是安徽地区载之正史的第一个家刻家。

1983年7月,在无为县虹桥乡出土了一盒《胡府君曹夫人墓志铭》。铭文记载了墓主胡士宗这个未出家的佛门信徒,不见经传的布衣,先后于北宋元丰(1078—1086年)中刻《金刚经》,崇宁元年(1102)刻《法华经》、《度人经》等3部道释经卷,计70余卷,印数分别为3000、5000部。这块全文594字的石刻铭文现藏无为县图书馆,是安徽地区发现最早的、最完整的出版文献(详《东南文化》1988年3期张宏明文)。

从《宋史·艺文志》等资料看,安徽地区南北官刻的主要出版物是方志、图经类政书。如《〔祥符〕宣州图经》、《〔祥符〕歙州图经》等。

整个北宋时期,安徽地区的图书市场是十分活跃的。《宋会要辑稿》第165册记载了大观二年(1108)七月二十五日,宋徽宗批准了走马上任的新差权发遣提举淮南西路学事苏辙的奏札,对附庸风雅的私刻和专为科举仕子投机取巧的参考资料等没有经过国家有关机构批准的坊间出版物加以禁断。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安徽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情况。

南宋时期(1127—1279年),淮北地区先后属金、蒙古、元政

权,江淮部分地区为战乱区,使这些地区已经兴起的出版业受到影响。江南地区局势相对稳定,所以在这个时期形成以徽州为中心,沿着江南、沿江地区发展的出版总态势。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南宋时期,安徽地区刻书近百种,130余起。复印重版次数较多的有《文选李善注》、《黄山图经》等。如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理宗朝递修的池州尤延之本《文选李善注》的修补版权页下就先后注有丙午(1186)重刻、丁未(1187)重刊、戊申(1188)重刊、壬子(1192)重刊、乙丑(1205)重刊、丙寅(1206)、景定(1260—1264年)重刊、壬戌(1262)刀、壬戌重刊等字样。自淳熙八年(1181)至壬戌(1262),仅80余年,尤延之本《文选李善注》的修补重印就达10次之多。《黄山图经》在宋代也印刷过4次。

笔者对宋代皖版书分类,按刻资渠道,官刻百起,80余种;家刻31起,31种。按刻书的分布地区统计,徽州刻书50起,45种,其中,官刻30起,25种。其它地区官刻是:池州22起,刻书11种;舒州(安庆府)刻书12起,10种;太平州12起,12种;广德军9起,9种;宣州(宁国府)8起,7种;庐州府4起,3种;滁州1起,1种。家刻中,徽州20起,20种,其中标有卷数的16种总卷数为463卷。其它地区的家刻为:无为军4起,4种,85卷;太平州4起,4种,44卷;宣州1起,1种;寿州1起,1种;舒州1起,1种。

南宋时期,安徽地区著名的官刻机构主要是州学和舒州公使库。安徽地区的州、府,甚至县衙都有官刻。著名的出版机构有:

徽州州学,又名新安郡斋,后为紫阳书院取代,目前已知刻书18种,连同重版计有20起,总卷数为793卷。著名的出版物有嘉泰四年(1204)沈有开刻宋·吕祖谦辑《皇朝文鉴》150卷、《目录》30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有该书的嘉定十五年(1222)、端平元年(1234)重修补版。该书是因江佃编《新雕圣宋文海》120卷,周必大认为所编语无伦次,奏请孝宗命吕祖谦重编。吕编本共收北宋800余家文章,赐名《皇朝文鉴》,吕氏也因此获赐绢、银各300匹、两。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的嘉定十六年(1223)刻宋·叶适撰《习学记言》50卷,末有汪纲镌版于郡斋跋。北京图书馆藏嘉熙四年(1240)刻宋·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统说》1卷。尤藻在新安刻宋·尤袤撰《梁溪遗稿》50卷,今仅存1卷。徽州版还有宝祐五年(1257)竹溪书院刻宋·方岳撰《秋崖先生小稿》83卷及徽州版咸淳元年(1265)刻汪莘撰《方壶存稿》等均为宋代名版。尤其是南宋淳祐六年(1246)在今歙县城(故徽州治)南门外建紫阳书院以取代州学,分别延徽州州学、新安郡斋、紫阳书院刻书,成为南宋著名的官刻机构。紫阳书院,缘于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世称紫阳夫子及城南5里的紫阳山。朱熹生于尤溪,寓居福建建阳(今福建建阳)。其外公祝确,字永叔,淳厚孝谨,朱熹曾作《祝公遗事》叙其身世甚详,贻赠表弟康国,使藏于家。祝氏系歙县世族,家产几近州城之半,人称祝半城,宅称祝太傅宅。朱熹每去歙县,常游于紫阳山,因有紫阳夫子之号。紫阳书院建成后32年,元兵南下,时南宋戍将李铨在抗元斗争中拆毁书院。入元后又草创紫阳书院于南门内,为徽州路儒学,明清时期为徽州府府学,是历代著名的书院,也是全国各地以紫阳命名中的最大书院和最大的书院型刻书机构。南宋时期著名的刻版要数淳祐十二年(1252)州守魏克愚刻其父魏鹤山先生经学著作10种327卷及咸淳六年(1270)刻宋·罗愿撰《尔雅翼》32卷。

池州州学,又名池阳郡斋、池阳郡学、秋浦郡斋,刻书11种,550多卷,还有十多次重版。著名的出版物有北京图书馆藏淳熙七年(1180)尤袤刻晋·郭璞撰《山海经》18卷,中华书局有此版本的影印本。淳熙八年(1181)知州袁说友刻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李善注》60卷、《考异》1卷,今北京图书馆藏初印本,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理宗间递修本,此版是尤袤参校十几种版本得失而定稿付梓的,为尤袤“俸余饒李善注本,袁说友助其费”,为李注中的唯一善本,无四明、贛上裁节语句之病。今存白纸60册,印刷

精湛,为清·胡克家仿宋的祖本。绍熙二年(1191)权池州知州张釜刻其祖父、宋·张纲撰《华阳集》40卷。嘉泰四年(1204)至开禧元年(1205)知州陈谟刻唐·房玄龄等撰《晋书》130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残配本。嘉定九年(1216)刻宋·李道传辑《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又称《朱子语录》、《晦庵先生语录》43卷,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残存7卷,北京图书馆藏胶卷。此版世称池录,字体秀劲圆活,线条细致精当,是与临安书棚本媲美的名版,也是朱子语录类最早的刊行本之一,为廖德明、辅广、余大雅、陈文蔚、李闰祖、李方子、叶贺孙、潘时举、董铢、窦从周、金去伪、李季札、万人杰、杨道夫、徐寓、林格、石洪庆、徐容、甘节、黄义刚、暖渊、龚盖卿、廖谦、孙自修、潘履孙、汤泳、杜夔孙、陈埴、钱木之、曾祖道、沈侗、郭友仁、李儒用等33位朱熹学生所记录朱氏平时的语录。李道传持江东庾节时刻于池阳,有朱熹女婿黄干的跋。宝庆三年(1227)知州王伯大刻宋·朱熹原著、王伯大重编《别本韩文考异》40卷、《外集》10卷、《遗文》1卷,为历代《韩文考异》刊本中最早、最精善的版本。绍定二年(1229)张洽刻《昌黎先生集考异》10卷。端平丙申(1236)江东仓使兼知池州王伯大纂修的《秋浦新志》16卷,也是官刻本。

太平州学,又称当涂郡斋、姑孰郡斋,刻书11种,550多卷,还有10多种重版。著名的刻本有今北京图书馆藏的乾道六年(1170)刻知州洪遵撰《洪氏集验方》5卷;七年(1171)知州洪遵刻宋·李恽撰《伤寒要旨》1卷、《药方》1卷;八年(1172)吴郡胡元质刻宋·杨侃撰《两汉博闻》12卷(又刊自撰《左氏摘奇》于当涂道院);淳熙五年(1178)当涂还刊《徐氏家传方》;嘉定十年(1217)吴正肃刻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解》中的《论语集注》10卷、《序说》1卷;《孟子集注》14卷、《序说》1卷;淳祐十二年(1252)知州马光祖新刻宋·朱熹撰《中庸章句》1卷、《大学章句》1卷,合嘉定十年刻两种,计4种28卷,此刻本注与本文皆大字本,为同类书中的善本,计7种47卷。还有乾道三年(1167)当涂假守吴芾刻宋·李之

仪撰《姑溪居士前集》50卷、《后集》20卷等，以及当涂刻郭祥正撰《青山集》30卷。

广德军学，又名广德郡斋、桐川郡斋，最著名的刻本为3种版本的《史记》。其中，初刻本为淳熙三年（1176）知军张杞据蜀小字本改中字本的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集解索引》130卷，此版抽掉蜀本中的褚少孙《续》，加入司马贞的《索隐》，今北京图书馆残存63卷，此版刻工为杭州地区的良工，为宋代同类版本中的善本；五年（1178）赵山甫莅郡，将褚少孙《续》别为一帙付刻；八年（1181）耿秉将三年本始次卷第，与褚少孙《续》合而印之，仍名《史记集解索隐》130卷，世称耿秉重修本，今北京图书馆收藏，成为元代九路儒学刻十七史的蓝本。广德军还刻汉·扬雄撰《二十四箴》。

宁国府学，又名宣州军州学、宣州郡学、宁国府学、宣城郡学、宛陵郡斋，著名的刻版有两刻北宋诗人梅尧臣的《宛陵集》60卷、《附录》1卷。其中，绍兴十年（1140）宛陵郡守汪伯彦在宣州军学刻本为南宋定本中的最初刻本；日本国内野五郎家藏宁国府学教授刘寅自嘉定十六年（1223）端午至次年正月重修的残本有30卷。绍兴二十七年（1157）楼炤在宣城郡斋刻齐·谢朓撰《谢宣城集》10卷中的5卷诗赋部分。淳熙十四年（1187）宣城刻曹冠撰《燕喜词》。宋末，宣城郡学刊宋·胡寅（注，安国子）撰《致堂读史管见》30卷，入元，版归兴文署；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宝祐二年（1254）宛陵郡斋刊明修补本。还有近人袁寒雪珍藏乾道间宣州公文纸印唐·李贺撰《李贺诗歌编》4卷、《集外诗》1卷，也是这类官刻本。

舒州州学，后升为安庆府学，又称舒州郡学、龙舒郡斋、舒州郡斋、潜山郡学，是江北和沿江地区最大的官刻机构之一，所刻书世称龙舒本。直署府州学的著名刻本有：绍兴十六年（1146）承刻淮西路交办的《太平圣惠方》100卷之半，此版错误较多。乾道三年（1167）潜山郡斋刻唐·柳宗元撰《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0

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淳熙三年(1176)印宋·赵明诚撰《金石录》30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此版无李清照(易安)后序,与舒州公使库刻本应为同一版本,后寿县境内小黄赵不谔本应为三印本。北京图书馆藏本纸质细薄类棉纸,字体劲秀,为宋代名版。绍兴间(1131—1162年)龙舒本宋·王安石撰《王文公文集》,又名《临川集》100卷,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清内阁大库藏本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存残本合成全帙本,今上海博物馆藏该版本之宋·向洵藏绍兴间印本中的76卷,字大疏朗,刻工精细,字如新篆。笔者在乡贤胡道静先生的帮助下,目睹了这一稀世珍本。它是用旧帐纸印刷的。宋人娟秀的字体犹如新写。从而说明宋代的安徽地区印刷书写材料的精美。

舒州公使库,该库刻本是库本中的佼佼者。今北京图书馆就藏有淳熙三年(1176)刻宋·赵明诚夫妇撰《金石录》30卷;宋·方闻一编《大易粹言》12卷《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著录为舒守曾(字献之)作序,方闻一撰《大易粹言》70卷、《总论》3卷;宋·洪迈撰《容斋四笔》64卷,以及《礼记释文》4卷,《春秋经集解》30卷,《礼记郑注》20卷等6种106卷。其中,《大易粹言》是泉州人曾(字献之)为舒州守时请本州学者方闻一参考75种图书写成,全书45万言,为《易》注类。录有各种费用及售价。比最早记有书价的绍兴十七年的黄州本《小畜集》,绍兴二十七年沅州本《续世说》,乾道九年高邮本《淮海集》,淳熙十年象山本《汉雋》,庆元二年华亭本《二俊文集》,嘉泰二年绍兴府本《会稽志》等书要全面得多。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发行资料。

笔者认为,作为舒州掌管财赋,接待往来官员的机关接二连三地刻这么多的书籍,且又多与州府学品种相重,肯定是具体工作为舒州州府学所为,它不过是挂名支付刻资的政府机构。因此,此类库本可视为府州学本。

类似此类官刻还有淮西路(治今合肥市,刻《太平圣惠方》100

卷之半)、庐州州学,又名庐州郡学两刻宋·包拯撰《包孝肃奏议集》10卷。绍兴十三年(1143)无为知军赵士彰刻杨杰撰《无为集》15卷,为大字,白纸印本。还有滁州州学,又名滁阳郡斋,今北京图书馆藏其刻宋·林钺辑《汉隽》10卷等。和州刻傅尧俞、范纯仁、刘摯撰《三老奏议》等。

南宋时期,安徽江南地区学术繁荣,家刻也是群星闪烁。著名的家刻有洪适、魏克愚等著名的官僚在安徽任地方官时所刻的书,安徽本地区的刻书家如歙县的祝穆,以及皖籍学者在外地刻书,如婺源朱熹、休宁程大昌、黟县汪纲、绩溪胡仔、寿县的吕乔年等。

江西波阳(饶州鄱阳)人洪适(1117—1184),在徽州知州任上积极扶植新安文房四宝的生产。据他在自著《盘洲集·文房四谱跋》中称,在郡学辑刻北宋·苏易简撰《文房四谱》5卷,附《歙州砚谱》1卷,《歙砚说》1卷,《辨歙石说》1卷。绍兴二十三年(1153)在新安郡斋辑刻其父洪皓撰《鄱阳集》10卷。绍兴二十六年(1156)始开刻洪皓撰《松漠纪闻》1卷、《续》1卷,终于越地。据近人王国维在《两浙古本考》中说,洪氏还在绍兴府刻《万首唐人绝句》101卷中的46卷,余版续雇婺匠竣工于容斋,所以洪遵在该版的跋里说“镂版于歙、越”。

四川邛州浦江的魏克愚在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衔出任徽州知州时在新安郡斋(紫阳书院)刻其父魏了翁撰《九经要义》263卷,《大易集义》64卷。其中《九经要义》中的《周易要义》10卷、《礼记要义》33卷、《仪礼要义》50卷,计3种93卷,今北京图书馆均有收藏。今北京图书馆还藏有魏氏在紫阳书院刻魏了翁辑《大易集义》64卷的宋刻元印本。这些刻本版刻精良,印制技艺精湛,一般学者都把它当作家刻经部的代表。此书版本价值大,《四部丛刊》影印《仪礼要义》50卷,就是据北京图书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等藏有的此种版本。今传世的《仪礼》单疏有缺卷,可据《仪礼要

义》补正。据《周易要义·方回跋》称,《九经要义》梓成后,书版存歙县紫阳书院,至丙子岁(1276)书院以兵兴废,书版尽毁。说明宋末刻完魏氏全部9种263卷。我认为这类出版物刻于州学,不应算为家刻,应属官刻。又据方回称,宋末魏氏经学10种版片一直存紫阳书院,丙子岁(1276)因元兵入徽州而毁《九经要义》9种263卷版片,而《大易集义》版片仍存。

朱熹在外为官讲学期间刻书很多。如他在漳州任上刻《易》、《诗》、《书》、《左氏春秋》,合称《四经》,又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注,合称《四书》。尤其是绍熙元年(1190)所始刻的《四书》,从此为地方官的主要刻书内容。他还在淳熙间刻其父朱松撰《韦斋集》等。他的子孙整理刊刻他的著作更是世代绵延不断。如其裔孙朱鉴就在端平乙未(1235)将其集注《楚辞集注》16卷刊刻。原刻仅有山东聊城海源阁旧存,为朱熹所作《楚辞集注》8卷、《楚辞辨证》2卷、《楚辞后语》6卷的最早最完备的合刻本。朱鉴还在兴国刻吴必大记录整理朱熹的讲学笔记、门人对话,定名为《师诲》,是朱子语录中的重要一种。他的家乡徽州府刻其著述更多。如淳祐十二年(1252)刻王伋续编《朱子语录》40卷,世称“徽本”,与李道传池州刻本——《晦庵语录》、李性传鄱阳刻本——《续录》等均为朱子语录类名刻。咸淳六年(1270)刻黎靖德编次的《朱子语类》140卷,系黄士毅分类编辑的分别刻于池州、饶州、建安的“池录”、“饶录”、“建录”的《朱子语录》的合编本,于嘉定十二年(1219)刻于眉州(今四川眉山),世称“蜀本”的《朱子语录》140卷。黎氏的这个刻本是将黄氏蜀刻本进行整理,删除重复,分为26门,仍为140卷,题名《朱子语类》。宋末,徽州府刻朱熹的《诗集传》,字体秀劲,线条绵密,版面精致柔活,可与临安的书棚本相媲美。

歙县祝穆父祝康国,为朱熹的表弟,曾祖祝确为朱熹的外祖父,祝氏为歙县世家,宅名祝太傅宅。祝穆为朱熹的表侄和学生,学识渊博,不愿出仕。晚年与子祝洙客籍建安府崇文县(今属福建)。

据《季沧苇书目》记载和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国时所看到的祝太傅宅在嘉熙三年(1239)刻自撰《新编四六必用方輿胜览》，整部70卷，因受刻资限制，分次开雕，随雕随印，使此种版本分《前集》43卷、《后集》7卷、《续集》20卷、《拾遗》1卷(据《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续志》著录无《拾遗》1卷，注为建安祝穆和父编，有新安吕午伯可序)。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卷6中全文转录了祝太傅宅干人吴吉在本书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开雕前申报两浙、福建转运使的录白中，我们推知淳祐初(1241)刻自撰《四六宝苑》比《方輿胜览》部头更大。淳祐六年(1246)开刻的《事文类聚》也分为《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0卷，计168卷。这3部家刻大书国内已成绝版。唯其子祝洙在28年后重整凡例，于咸淳二年(1266)至三年(1267)年在寄籍地福建建安府崇文县再版《方輿胜览》现仍见存。今北京图书馆收藏此类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予以影印，可窥见祝穆原家刻本概貌。元麻沙坊刻元·富大用、祝渊两人增补和有篡改痕迹的《事文类聚》7集336卷1327目中可窥见祝氏原版4集170卷885目的概况。

祝太傅宅和祝洙上述刻书经申报并得到批准的两浙、福建转运司保护版权的榜文均刻在书序后，作为录白。据文告所述，一旦出现违禁，允许祝氏告发，追人毁版，断治施行，惩处是很严厉的。它成为迄今发现的安徽地区刻印书籍中最早的官方保护版权的文件，也是全国见诸全文的最早最完整的版权保护文件。

绩溪县胡仔(1110—1170)，为宋直臣胡舜陟(1083—1143)次子。其父残遭秦桧构陷而死后，卜居浙江湖州苕溪隐居，主要著作有百卷《苕溪渔隐丛话》。该书是长达52.5万字的诗话总集，初版于今属浙江的绍兴府学，分别有戊辰(1148)春三月上巳、乾道三年(1167)中秋自序，字仿欧体，雕版极精。

黟县著名的学者汪纲是南宋时期与长沙赵淇、临邛韩醇、杭州陈解元、岳珂、寥莹中、建安余氏勤有堂齐名的七大私刻家之一。汪

纲刻书大多是在外为官所为。如嘉定三年(1210)汪纲在高邮知军任上再刊陈鄂《农书》3卷,秦观《蚕书》1卷。嘉定十七年(1224)在绍兴知府任上在会稽郡斋刻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10卷;汉·袁康、吴平辑录的《越绝书》15卷,并分别将此版转让给家乡徽州州学新安郡斋印行,加上徽州新安郡斋题记。又将家乡徽州州学所刻宋·叶适撰《习学记言》等书拿到会稽印行。还将洪适守绍兴刻自选《万首唐人绝句诗》前46卷与后55卷刻于鄱阳本中的鄱阳部分拓刻于绍兴府,以成完璧。

寿县的吕氏为宋代重臣之后,吕祖谦因编呈《宋文鉴》而得皇上御赐银、绢各300两、匹。其侄吕乔年将吕祖谦专著以外的零作,编为《东莱集》40卷、《年谱附录》3卷、《拾遗》1卷,将其父遗著编为10卷,于嘉泰四年(1204)家刻于婺州(今浙江金华)。今北京图书馆所藏版本为此版的元明递修本,题宋·吕祖谦撰《东莱吕太史文集》15卷、《别集》16卷、《外集》5卷、《附录》3卷、《拾遗》1卷,宋·吕祖俭撰《丽泽论说集录》10卷。

休宁的学者程大昌(1123—1195),于淳熙四年(1177)写成《禹贡论山川地理图》5卷,得到孝宗皇帝的赞许,诏付秘书省收藏。今北京图书馆藏程大昌在淳熙七年(1180)以敷文阁学士衔守泉州时,于翌年在郡学刻自撰《禹贡论山川地理图》5卷,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确切记载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的地图册。

安徽学者在外地所刻名书还有濡须王遵于庆元中,在临江刻孔文仲、武仲、平仲撰《清江三孔集》等。

入元以后,安徽地区继承和发展了南宋的出版态势,但仍保持着官刻、家刻两种出版形式。

元代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后接受汉文化影响,元代刻书业仍然承宋代之盛。由于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并严格控制舆论,对公私刻书进行严格审查,造成元代

刻书业不仅没有阔步发展,反而远逊宋代。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说,元人著述 3000 余种,元刊元人著述可考的仅 200 种,连同宋刻元修元印本及元刻古书,元刊本可考的也仅有三四百种。其中刻书较多的要数各路儒学和书院。私人刻书更难,需由当地士绅呈请学使,再转呈中央学部批准方能刻印,故元代家刻、坊刻较少。

据我对元代安徽地区刻书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 57 起,51 种。按刻资渠道和分布地区归类为:官刻 25 起,20 种,家刻 32 起,31 种;徽州路印书 33 起,32 种,其中官刻 8 起,8 种,家刻 25 起,24 种。元代徽州路刻书的区域性中心地位已大大加强。其他地区官刻 17 起,12 种;宁国路 6 起,5 种(含王桢木活字版《〔大德〕旌德县志》);广德路 7 起,5 种;池州路 2 起,1 种;太平路 1 起,1 种。其他地区家刻 7 起,7 种;宁国路 3 起,3 种;池州路、安庆路、广德路、濠州路各为 1 起,1 种。

· 元代的安徽地区官刻以各路儒学为主。尤其是江南 5 路参与九路儒学刻十七史是元代地方重大的官方联合出版活动。

这次协作出版活动在元大德年间。主要是江浙行省江东建康道所辖今皖属宁国、徽州、太平、池州、广德及今苏属集庆(又名建康),今赣属饶州(又名瑞州)、信州 8 路和赣属铅山州儒学分片包干分刻十七史。据《天禄琳琅书目》载的建康路刊《新唐书·跋》及太平路儒学所刻《汉书·孔文声跋》及日本国神田喜一郎博士的《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考》(载 1969 年《东洋学文献丛说》)称,这次重大的官方联合出版活动,由太平路儒学申请发起,得到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的批准,并决定由副使伯都任提调,向所属 8 路 1 州发出由太平路儒学首刻《汉书》为样本,半页 10 行,每行 22 字,以所属各路儒学的经费、人力分头校刻 17 部正史。

这次重大的地方出版活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徽州路和铅山州儒学没有参与这次活动,只有 7 路儒学共刻有 10 史: